

和平或戰爭？ 臺灣媒體對中國大陸軍事新聞報導框架分析^{*}

那瀉

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研究生

王泰俐^{**}

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

劉好迪

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副教授

摘要

本研究以 2020 年 8 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對臺軍事演習為案例，借徑國際衝突常見的戰爭／和平新聞學及愛國主義框架等理論，從四家主流媒體的消息來源、關鍵詞、描繪形象等面向，探究報導內容分歧，及對臺海衝突議題的態度與立場傾向。量化研究發現，臺灣四家媒體對國際衝突中母國與敵國的好惡表達，及認定臺、美能否阻止中共武力犯臺，報導立場與使用框架皆有顯著差異，而消息來源使用和報導數量則相反。《中國時報》使用和平新聞學，《自由時報》、《蘋果日報》傾向戰爭新聞學、愛國主義等框架、表達對中共政府的負面情緒，認定中共無法成功犯臺；《聯合報》在各種框架呈現上則較持平。本文也以質性分析闡釋、討論，並在末尾提出探討限制及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關鍵字：和平新聞學、軍事新聞、新聞框架、臺海衝突、戰爭新聞學

^{*} 本文為第一作者的碩士論文，部分內容經大幅修改且增加質性分析資料而寫成。作者群由衷感謝編輯團隊以及審查委員提供本文詳盡的修改意見。

^{**} 通訊作者，E-mail: tai.liw@ntu.edu.tw

投稿日期：2023 年 01 月 21 日；接受日期：2023 年 06 月 11 日

壹、問題意識：中國軍演是現在進行式

2022年8月2日，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訪臺，成為近25年美方來訪最高層級（FitzGerald, 2022, August 14）。此事引發中國當局不滿，派遣中國人民解放軍（簡稱解放軍）於8月4日至7日在臺海展開大規模實彈軍事演習。訪臺期間，她發表演說，宣稱要「清楚表達」（unequivocally clear）美國絕不會背棄承諾；同時間中共強硬回覆，稱「美國必將為裴洛西訪臺付出代價」，使臺灣成為中、美兩國衝突加劇的導火線（Tan & Molloy, 2022, August 3）。臺海衝突再度成為影響印、太和平的重要議題，並引發全球關注（Blanchette et al., 2022, August 15）。

事實上，臺灣身處亞太地區交通與戰略位置，加上複雜的政治與歷史背景，使其成為阻擋中國發展為亞太軍事強權的重要力量（林海清，2005），中共因此始終重視對臺統一問題。當今中共經濟、軍事實力皆為世界強權，軍事預算2020年已達2520億美元（世界第二），佔全球軍事支出的13%（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2020），¹形成對臺灣國土的最大威脅。

中共為加強對臺恫嚇，近幾年共機繞臺飛行已漸常態化（薛中鼎，2018年6月1日）。美國國防部（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簡稱USDOD）（2021）、中國大陸國臺辦旗下媒體《中國臺灣網》（2020年，12月5日）明確指出，中國大陸武力統一臺灣的可能性持續提高，只要臺灣社會秩序稍有變動，就可能引發臺海戰爭。

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簡稱EIU）（2021）就將兩岸衝突列在全球十大風險事件之一，美聯社（Associated Press，簡稱AP）（Rising, 2021, October 14）也指出，臺灣當前局勢如同中、美兩國間的「火藥庫」（powder keg）；若中、美兩國持續無法取得共識，隨時可能觸動戰爭。中共官方背景的軍事雜誌《艦船知識》（美國之音，2021年7月6日）也發布文章和影片，描述武力攻臺的具體步驟。

在此情勢下，臺灣民眾對於兩岸可能的軍事衝突以及全球戰略或國際局勢的認知，卻顯得起伏不定，擺盪於「樂觀」和「悲觀」之間。臺灣民意基金會曾進行調查，發現有74.1%的受訪民眾不同意中共「遲早會出兵攻打臺灣」，僅15%民眾同意；但同一基金會於2021年10月進行調查時，卻剩下

1 本刊編輯註：此機構名稱，中文譯為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簡稱SIPRI。

64.3% 民眾不同意，同意比例則升至 28.1%，幾乎翻倍（陳煜，2021 年 11 月 2 日）。

由於臺灣在政治上國際處境孤立，經濟和軍事實力又與中國大陸懸殊，因此在兩岸衝突中，臺灣能否得到國際援助與支持也是國安的重要議題，但國人對此議題的認知與態度也隨著國際局勢不時擺盪。臺灣民意基金會民調曾詢問民眾「若中共武力犯臺，美軍是否會協防臺灣？」，有 65% 民眾同意、28.5% 不同意（陳煜，2021 年 11 月 2 日）；2022 年 3 月民意則呈現 34.5% 同意、55.9% 不同意，一來一往差距約 30%。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指出，相關結果前後迥異，很可能是因 2022 年 2 月俄烏戰爭爆發，烏克蘭方孤軍處境對臺灣民意產生重大影響（陳煜，2022 年 4 月 26 日）。

可見臺灣民眾對於身處環境的安全意識，深受國際局勢影響。學者指出，媒體對於國際局勢的描繪很可能加劇衝突本身 (Arno & Dissanayake, 2019)。隨著兩岸關係越加緊張，研究臺灣新聞媒體以何種方式報導國際局勢與兩岸衝突，也成為重要議題。這也是本文選擇 2020 年 8 月解放軍對臺軍演做為案例，探究臺灣媒體以何種框架呈現兩岸軍事新聞的契機。

貳、文獻探索

一、臺海危機

臺灣自 2016 年政黨輪替以來，中國和民進黨政府在國家主權、國際關係上缺乏共識，加上中、美貿易戰，臺海兩岸關係益發緊張，臺、美國防關係則越加親近。2016 至 2023 年，的美國對臺軍售總額超過 400 億美元，約是陳水扁、馬英九兩任前總統 16 年總和（程嘉文，2023 年 7 月 1 日）。

2020 年臺灣總統與立委大選，在香港反送中運動和國民黨籍高雄市長韓國瑜背棄市民承諾、參選總統的背景下，民進黨再度勝選，蔡英文總統甚至拿下史上最高的 817 萬多票。

兩岸關係自此更加緊張，中共外交部、國臺辦等政府單位頻繁公開批評臺灣政府，內容多與主權、意識形態和接受美國軍售有關，而具體的軍演和共機擾臺情形也大增。媒體彙整中華民國國防部資料顯示：2019 年 3 月共機首次進入臺灣西南防空識別區有 10 架次，2020 年則增加到 380 架次，2021 年 961 架次、2022 年 1727 架次（中央社，2023 年 1 月 2 日），呈直線上升。

2020年8月5日，美國在臺協會（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簡稱AIT）突然宣布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長艾薩（Alex Azar）將訪臺（陳韻聿，2020年8月5日），成為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41年來少見中央層級的訪臺官員。8月9日艾薩抵臺，中國大陸強勢回應。先是在8月11日出動殲11、殲10戰機飛越海峽中線，（近20年內僅有3次飛越），緊接著解放軍8月13日發表聲明，宣布隔天（8月14日）開始至9月1日約3週時間內，將在臺灣海峽南、北段執行海、陸、空及火箭軍的綜合軍事演習。聲明中也批評艾薩訪臺事件損及中國主權和國安：

近來個別大國在涉臺問題上消極動向不斷，向臺獨勢力發出嚴重錯誤訊號，嚴重威脅臺海地區和平與穩定（游凱翔，2020年8月13日）。

這在當時被視為自1996臺灣海峽飛彈危機以來，最嚴重的兩岸衝突（陳言喬等人，2020年8月13日）。面對緊張的國際情勢，臺灣各家媒體對軍演事件均有大量新聞，但不同媒體之間報導的歧異相當大。以平面報紙四家主流媒體為例，在政治傾向上不同的媒體，相同的新聞事件似乎有截然不同的報導框架與態度。

普遍被認為親民進黨（綠營）的《自由時報》，當時有許多戰爭傾向、持愛國主義立場、對中國大陸持負面態度，並相信美國軍事上會協防臺灣，以同樣報導中國大陸軍方對臺的動作而言，《自由時報》報導曾稱：「喊攻臺是假象，根本打不了」、「龐皮歐（美國時任國務卿）指美國不會坐視中國犯臺，鄭運鵬：國內親中人士可以閉嘴了！」（自由時報，2020年10月7日）。而立場親國民黨（藍營）且向來支持兩岸統一的《中國時報》則在同時有許多和平傾向、不持愛國主義立場、對政府作法持負面態度，不相信美國軍事上會協防臺灣的報導，如「臺海兩年內必開戰？美國學者爆驚人預測」、「臺海開戰美軍不會幫？專家爆：在國會親耳聽到」（李俊毅，2020年10月6日）。

媒體引述消息來源並按照自身立場撰寫新聞，會形成特定的報導框架，進而影響民眾對國際與國安局勢的了解。而媒體間對兩岸衝突歧異的報導框架與態度，不但影響民眾感知，也會造成不同媒體閱聽人之間的民意分化。

為了驗證不同媒體對臺海衝突報導的歧異，本研究以2020年8月這場臺海周遭最重要的中共軍事演習為例，擬分從「消息來源」、「戰爭新聞學框架」、「和平新聞學框架」與「媒體態度」等角度切入研究。

受限於特殊政治環境且臺灣已長年未經戰事，對於臺灣媒體如何報導與自身切身相關的軍事衝突的相關研究，相對匱乏。本研究因此從傳播者（新聞媒體）的報導形式出發，除了分析媒體透過哪些消息來源獲取軍事報導資訊外，也援引國外相關研究經常使用的「戰爭新聞學／和平新聞學」以及「愛國主義框架」等新聞框架概念，嘗試分析臺灣不同立場的媒體如何以特定新聞框架，引導閱聽人對臺海局勢形成不同的感知與了解。

挪威社會學家 Johan Vincent Galtung² 首先提出「和平新聞學」概念，主張媒體使用提倡和平的形式，對戰爭和國際衝突進行報導。他也在之後的研究中陸續發展出「和平新聞學」以及「戰爭新聞學」的相關研究指標（Galtung, 2002）。後續研究者受 Galtung 的啟發，也發展出另一個框架概念，稱為「愛國主義新聞學」框架（patriotic journalism），意指媒體在國際衝突中堅定支持其母國的報導方式（Ginosar, 2015; Kellner, 1992; Rojecki, 1999）。

本研究因此以「戰爭或和平新聞學」以及「愛國主義新聞學框架」為理論基礎，針對臺灣媒體對兩岸軍事衝突的報導，分別從媒體消息來源、報導框架及對衝突結果的態度等研究角度，進行探究。

二、 框架理論

框架（framing）理論最初被英國人類學家 Gregory Bateson（1904-1980）用以解釋詞彙的多義性；他從心理學研究的角度指出，同一個詞彙含有很多不同的定義與解釋角度，即為不同的框架（Bateson, 1955）。美國社會學者 Erving Goffman（1922-1982）則借用 Bateson 的心理學觀點解釋人類對社會真實的主觀認識。Goffman 指出，社會事件本身是獨立的，相互事件之間並無歸依，人們透過符號轉換，使之成為具有關聯意義的主觀認知。而轉換符號的過程，即是框架（Goffman, 1974）。可見框架是人們把「社會真實」轉換為「主觀思想」的關鍵。而在爬梳、整理並吸收訊息的過程中，框架的存在無可避免（臧國仁、鍾蔚文，1997）。

讀者在閱讀與理解新聞報導時，會有屬於自己的框架，而傳播者（媒體）在生產新聞報導時，卻同時受到兩種框架的影響：第一種是了解新聞議題、

2 新左翼的代表性學者，出生於挪威奧斯陸，在挪威與美國任教；1959 年奧斯陸和平研究所（The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簡稱 PRIO）的主要創始人，也於 1964 年創辦了《和平研究期刊》，今日通稱的「和平學」（peace research）由此蘊生。

採訪消息來源的過程中，傳播者把「社會真實」轉換為「主觀思想」的框架；第二種則是媒體在產製新聞時，將「主觀思想」轉化成新聞文本的框架。這層框架被稱為「新聞內容的中心組織」，意指媒體通過選擇、強調和排除來凸顯某些特殊議題（Tankard et al., 1991）。

美國電視媒體與政治學者 Robert Entman (1949-) 稱這個動態過程為框架化 (framing)，Entman (1993) 指出，框架化即選擇和強調現實中的某些特徵，進而從中定義問題 (define problems)、解釋原因 (diagnose cause)、道德評估 (make moral judgment) 並建議處理方式 (treatment recommendation)。這些訊息會體現在文本中的關鍵詞、描繪形象、消息來源，和文中主題相關的事實評判。

在框架化過程中，「定義問題」先以特定詞彙和概念讓文本指涉的問題限定在一特定範圍內，以利解決；「診斷原因」會分析和解釋問題出現的根本原因；「道德評估」以價值觀評判問題所涉及的人們是否符合社會期望；「提出解決方案」則是呈現解決問題的方法和策略 (Entman, 1993)，以便閱聽人能理解和記憶 (Entman, 2004)。

新聞媒體作為提供社會大眾時事資訊的主要力量，其文本的框架化過程影響著社會主流意見，框架更可能構建閱聽人腦中的圖像 (map)，讓他們對新聞議題產生特定認知和態度 (Gamson, 1992)。例如 Gamson 指出，冷戰³期間美國外交新聞對「冷戰」的框架，就凸顯了整個時代背景下的新聞事件；西方主流新聞報導先是定義冷戰作為特定問題，並將全球各國的共產主義叛亂解釋為其原因。在道德上，媒體將共產主義評估為無神論對於西方文明的侵略，並讚揚特定的解決方案，即 1956 年美國通過國會法案將「我們信仰上帝」確立為美國官方格言。

而檢視兩岸關係新聞議題，以前述《中國時報》、《自由時報》在 2020 年 8 月中共軍演期間的報導為例，兩岸衝突升溫已顯然被主流媒體視為特定問題。透過 Entman (1993) 的「框架化」，本文希望進一步剖析這些問題如何被主流媒體討論。在原因解釋上，媒體如何定義問題主因？是中共對臺的武力威懾，還是臺灣政府「抗中親美」的立場？在道德上，媒體傾向認定中

3 冷戰 (Cold War, 1946-1991)，指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蘇聯這兩個世上綜合國力最強國家之間的國際競爭。從國家意識形態「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爭，延伸到軍備和經濟、科技實力競賽。由於美蘇雙方都握有大規模殺傷核武，因此從未有過直接軍事衝突。但雙方的盟國間發生過許多規模較小的常規戰爭「熱戰」，如：韓戰、越戰、臺海危機。冷戰在 1980 年代蘇聯陷入經濟和產業結構危機後逐漸式微，直到 1991 年蘇聯解體。

共武統野心不符道德，還是將臺灣政府的臺獨立場視為應被譴責的「分離主義」？而解決方案的面向上，是臺灣政府應透過政治上親美、增加美國對臺軍售，還是應主動向中共展示友善姿態？

本研究將探討「框架化」過程在兩岸關係議題中，如何引導社會大眾對議題形成的腦中圖像，並分析軍事新聞議題的媒體分歧。

三、消息來源與框架

前述 Entman (1993) 提到，新聞的消息來源與文本中的關鍵詞、描繪形象等元素影響著新聞的框架化過程。而消息來源是新聞素材的主要提供者，媒體對消息來源的選擇對新聞立場與意見具有重大的影響。記者在取捨（報導）材料時，就已經展現出了主觀意志（闕志儒，2011）。

以政治與國際新聞而言，常出現媒體大量引用少數特定消息來源的情況，其中又以官方消息來源（政府官員、國家軍事單位首長）最為關鍵。原因在於官方消息來源掌握了政治與國際關係領域的資訊，而媒體很難從其他管道獲得這些資訊。Gans (1979) 就指出，新聞媒體不能單獨決定新聞價值，重要的是特定消息來源所提供資訊是否有用，需依賴雙方固定而良好的關係。Weaver & Wilhoit (1986) 更直言：在新聞產製過程中，記者與消息來源是伙伴關係，導致記者過度依賴消息來源。Perloff (2014) 也發現，即便社會上同時存在著政府、社會菁英與一般民眾的言論，但主流媒體在最後報導時只會留下並呈現政府和社會菁英的聲音。

此外，新聞工作的性質也導致了媒體過度依賴來源。由於新聞工作屬於「非常規性工作」（non-routine work），新聞工作者每天需面對大量預期之外的狀況（Tunstall, 1971）。為了解決此情況，新聞工作者必須將新聞產製流程常規化（routinized）才能更有效率且穩定的產出新聞（Shoemaker & Reese, 1996）。其中最重要的新聞常規就包括「守線」，意指新聞工作者必須時刻保持（通常是每日）與報導議題相關的官方機構、民間組織等消息來源聯繫。這也導致新聞經常被批評偏重官方及權威的消息來源（臧國仁，1998）。

Peake (2001) 研究指出，美國政府官員一直以來都會利用身為新聞來源的角色，藉由媒體報導來宣傳自身外交政策。而 Gans (1979) 更直接將新聞從業人員與固定消息來源間的關係形容為共舞，意指雙方只是在舞臺上一起向閱聽人演一齣戲。

在與消息來源「共舞」的關係，新聞工作者很難獲取並揭露對這些官方消息來源不利的新聞資訊，Entman（2004）就批評媒體在與官方消息來源的互動中「過於屈從於政府」。他也指出，從記者在報導中所選擇的消息來源、所描述的社會秩序和情境，就可反映出新聞中的社會權力。

消息來源對新聞文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政治與國際新聞中的官方消息來源更佔據主導地位，因此消息來源的數量及消息來源屬性也是本研究分析的重點之一。

四、戰爭新聞學／和平新聞學與框架

戰爭／和平新聞學報導方式是學者 Galtung 提出一套分類媒體如何報導國際衝突的報導框架，媒體可能傾向用鼓吹國際衝突的方式報導（戰爭新聞學）或傾向訴求和平（和平新聞學）。而觀察媒體是否有這些報導傾向，可以透過分析媒體強調國際衝突的哪些面向、對戰爭的反應、是否以菁英消息來源為主（Galtung, 1986）。本文作者認為以上概念可呼應 Entman（1993）在框架化過程提到的「消息來源、關鍵詞、描繪形象」等元素，也認為戰爭新聞學的這些框架分析面向，足以推動新聞框架化的過程。

在新聞報導中，衝突元素一直佔據著重要地位，也是新聞框架的重要元素。Shoemaker et al.（1991）就指出，用以辨識一事件是否值得報導的「新聞價值」（news value）本身最重要的元素，就包含衝突、聳動、異常和重要。

de Vreese et al.（2001）也很重視衝突元素在新聞框架中扮演的角色。他們指出，幾乎所有新聞都無法脫離一些新聞常見基本元素，如：「衝突框架」（conflict frames）、「人情趣味框架」（human interest frames）、「道德框架」（morality frames），以衝突框架最常見。

「衝突框架」能用以反映人與人之間存在的各類型衝突和分歧（Neuman et al., 1992），而 de Vreese et al.（2001）更指出，衝突框架本身就在強調「個人、團體、機構或國家之間的衝突」，且被普遍使用。而越是嚴肅的媒體，衝突框架在報導中出現越頻繁。

Putnam & Shoemaker（2007）則說明，衝突框架會引起人們關注對立、緊張、分歧和不相容的情緒。Schwalbe et al.（2008）研究 2003 年美伊戰爭的美國新聞報導，發現媒體先後分別使用過衝突框架、支持美軍的愛國主義框架（Patriot Frame），到戰爭後期才慢慢轉向人情趣味框架，以展現美軍

部隊和當地平民的友好互動。而 Evans (2010) 分析《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對以色列軍隊在 2002、2007 年兩次中東軍事行動的報導，發現多數報導都使用衝突框架，軍事衝突事件不但最有新聞價值，也最吸引政治決策者和媒體的關注。Fawcett (2002) 研究愛爾蘭媒體對於國際衝突的報導也發現，媒體認為衝突框架遠比提倡和平解決國際衝突的調解框架 (Conciliation Frames) 更具吸引力。

對於上述衝突與調解兩種戰爭或軍事新聞框架，挪威社會學者 Galtung 於 1970 年代首先提出了「戰爭新聞學」(War Journalism) 與「和平新聞學」(Peace Journalism) 兩種新聞報導方式，分別鼓吹加劇國際衝突與倡議和平解決國際緊張 (Galtung, 2002; Lynch, 2006)。

正如衝突框架受到新聞媒體廣泛使用，戰爭新聞學也是媒體報導衝突新聞時，傳統上採用的主要方式 (Aslam, 2011)。Galtung (1998) 指出，傳統的新聞媒體普遍存在一種價值觀：戰爭發生當下是國家、民族的存亡之際，公平與對錯並不重要。因此面對涉及母國的國際衝突，媒體在報導角度上，會追求對「己方」政府的支持，並且較關注屬於「我們」陣營這一方的事務。

Lynch & Mcgoldrick (2005) 認為，戰爭新聞學的報導方式隱含著暴力取向，不但讓國際間「暴力循環」形成的結構性因素失焦，更會阻止衝突中各國政府為了避免暴力發生而做出努力。Galtung (1998) 為此十分重視和平新聞學，並主張和平新聞學是這時代更重要的報導方式，媒體應如實報導戰爭與和平情況，並促成戰爭過程公開透明。

按照 Galtung 最初的分類，分辨一則新聞報導的主要敘事方式更偏向戰爭新聞學還是和平新聞學，涉及到十三個指標。其中包括十個報導方法指標和三個報導語言指標。透過內容分析法，研究者能以上述指標在一新聞報導文本中含有的數量分佈，判斷報導較傾向戰爭新聞學，還是和平新聞學。

這十個報導方法的指標包括有：(1) 對戰爭的反應 (reactivity)；(2) 戰爭影響能見度高 (visible effects of war) / 戰爭影響能見度低 (invisible effects of war)；(3) 菁英導向 (elite orientation) / 人民導向 (people orientation)；(4) 強調 (敵我) 差異 (differences) / 強調解決爭端 (solution)；(5) 關注衝突當下現場 (focus on here and now) / 關注衝突原因和結果 (causes and consequences)；(6) 好壞二分法 (good, bad dichotomy) / 避免好壞標籤化 (avoid labeling of good, bad)；(7) 選擇站在衝突一方立場 (party involvement) / 不站在特定一方立場 (non-party involvement)；(8)

偏袒（戰爭中）一方（partisanship）／無偏袒傾向（non-partisan）；（9）視戰爭為零和博弈（zero-sum）／視戰爭存在雙贏可能（win-win）；（10）報導的連續性（continuity of reports）。而三個與報導語言相關的指標則包括（1）報導是否使用妖魔化的語言（demonizing）、（2）是否使用受害的語言（victimizing）；（3）是否使用情緒化的語言（emotive）（Galtung, 1986）。

自 1990 年代至 21 世紀以來，和平新聞在概念和專業性上不斷成長、變化（Becker, 1982; Hackett et al, 2000）。許多後來的學者都對原先的架構進行了批評，例如：指標太過於二分法（Hanitzsch, 2007）、缺乏經驗基礎研究支持模型有效性（Peleg, 2007）。Lee & Maslog（2005）改良上述指標，讓許多項目都有了更具體的描述，例如將「選擇站在衝突一方立場／不站特定一方立場」，改為「偏好衝突中的一、二方（framing preferences for one or two parties）／多方框架偏好（multi-party framing preference）」。Kempf（2002）也發展了一套分析衝突事件報導的框架，共包含七個面向，例如報導將衝突概念化與否、報導對戰爭各方權利和意圖的評估、報導是否在衝突中加入情感元素等。

本文認為，以上學者陸續提出的戰爭／和平新聞學更迭的框架內容分析指標，如能與 Entman 的「框架化」理論結合，將能更完整地建構研究軍事新聞報導的新聞框架。

Entman 在框架化過程中的「定義問題」涉及到媒體對戰爭的反應、認定戰爭影響能見度高低，也涉及媒體是否將衝突概念化。而媒體定義問題的嚴重程度、如何定義問題，又分別與媒體的新聞報導數量、如何使用消息來源（菁英或人民導向）高度相關。其中菁英消息來源包含了一國政府官員、軍事組織、專家學者等官方或明顯具權威的機構與個人（Galtung, 1986）。

「原因解釋」與報導是否較關注衝突當下現場（或較關注衝突原因和結果）有關，也關乎報導對戰爭各方權利和意圖的評估。而「道德評估」與報導是否好壞二分法、偏袒或站在戰爭中任一方立場有關。「提供解決方案」與報導強調（敵我）差異或強調解決爭端有關，也決定媒體是否會視戰爭為零和博弈（或存在雙贏可能）。而透過框架化中的要素如關鍵詞、描繪形象和消息來源，除了能判斷報導中是否使用妖魔化、受害、情緒化的語言（或是在衝突報導中加入情感元素），也進一步確認報導中的「道德評估」。

許多國際衝突與戰爭的相關研究都採用上述幾種軍事報導常用的框架與報導取向；眾多研究則普遍指出，戰爭新聞學框架更常被主流媒體用於報導

國際新聞，也對大眾更具吸引力（Forgette & Morris, 2006; Garrison, 1991）。

例如 Hussain & Siraji（2018）就發現，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兩個國家的媒體都傾向於使用戰爭新聞學框架報導當地內戰衝突；Lee & Maslog（2005）比較八家亞洲媒體對世界各地衝突的報導，發現它們多數對亞洲地區的衝突事件（例如中印克什米爾領土爭議、斯里蘭卡獨立運動、印尼亞齊省內戰）使用戰爭新聞學框架；Chungs et al.（2014）則觀察北韓核彈試驗造成國際關係緊張的新聞報導，發現美國媒體更傾向使用戰爭新聞學框架；馬來西亞學者 Fong & Koon（2019）則研究馬國發行量最大的英文報紙《星報》（The Star）對南海爭端的報導，發現報導以戰爭新聞框架為主，但報導對中國的喜好則持中性態度。

總結而言，以衝突元素為核心的戰爭新聞學框架是主流新聞媒體報導國際衝突時的主要框架。而當新聞媒體母國參與國際衝突時，媒體勢必也難置身事外，由戰爭、和平新聞學相關理論衍伸出所謂的「愛國主義框架」。

五、愛國主義框架

愛國主義（patriotism）源於拉丁語中「祖國」（patria）一詞（Flowerdew & Leong, 2007）。愛國主義屬於人類的基本情感之一，因它講述了一個將不同人們聯繫在一起的故事（Sennett, 2003）。而人們也傾向於認為培育自己且感到熟悉的人、地方與制度是對的（Schaar, 1981）。

基於以上理由，許多學者認為主流媒體使用愛國主義也相當司空見慣。（Kellner, 1992; Rojecki, 1999）指出，媒體在報導國際衝突時容易持有國內主流觀點並配合政府的說法，採取愛國主義立場。Ginosar（2015）直言愛國主義新聞是現代民主國家菁英、主流媒體在本國面臨軍事衝突、恐怖主義或國家安全受威脅時，廣泛採取的報導手法。

國家與民族間的衝突，往往會導致愛國主義（及民族主義）上揚（Moshe, 2004）。而國家面臨危機時，媒體也常因害怕自己看起來不愛國（Graber, 2003）而不敢表達異議，甚至不敢報導非主流意見（Brody, 1991）。

愛國主義常體現在強調媒體母國強大與正當性中。例如 Schwalbe et al.（2008）指出，美國新聞媒體在構建伊拉克戰爭時，會優先考慮美國觀點（而非伊拉克觀點），並強調勝利、自由等主題和美國的英雄主義，而不是討論戰爭帶來的損失、失敗和破壞；Reynolds & Barnett（2003）也指出，2001

年美國 911 恐怖襲擊事件後，社會菁英等消息來源為了替美國受襲擊後的軍事反擊和國家團結提供正當性理由，於是發布各種類似於「美國受到攻擊」的頭條新聞，建立了一套對國內形成愛國共識的框架。

上述情況也都是媒體過度引用官方消息來源的結果。衛報記者 Katharine Viner (2016, July 12) 就曾表示，多數的媒體報導，經常會表現出對現狀的偏見和對權威的尊重。Decillia (2018) 也指出，媒體就是過於倚賴菁英消息來源，導致記者想要挑戰國家官方對於軍事行動正當性的種種說法時，顯得非常無力。他研究新聞媒體報導加拿大軍隊在阿富汗的軍事行動，發現媒體封面、標題上都優先呈獻政府、軍方消息。即便有些記者會對軍方的說法進行「事實查核」(fact check)，但因官方訊息太過碎片化，導致報導無法對官方說法提出有力的質疑。

這些觀點與前述官方消息來源對國際政治新聞擁有極高影響力的說法一致。Nossek (2004) 指出，愛國主義和新聞專業價值觀並不相容，原因是和官方接觸的新聞工作者，在報導國家利益方面，常使用官方給定的消息內容。

這種含有愛國主義的新聞報導有可能導致危險的後果。例如 Baker & Oneal (2001) 認為，只要夠高比例的媒體和政治團體有共同的愛國主義言論，不論正確與否，仍會直接導致大多數的民眾支持相關政治議題。而 911 事件後，哈佛大學學者 Alex Jones 也曾警告媒體與社會，國內出現大量情緒化、社論式且支持美國方的報導是可以被理解的，但若不對新聞內容保持警惕和批判，將喪失媒體對新聞工作標準的忠誠 (Rutenberg & Carter, 2001)。

媒體的愛國主義，也體現在對外（或敵國）的排斥。Schudson (2003) 研究發現，持愛國觀點的記者，會將愛國主義的新聞框架強加於事實之上，並公開將「自己」描繪成全國公民的「我們」以增加民族歸屬感；Thetela (2001) 也發現，國家或民族間的衝突，媒體常作為重要推手，使議題被社會價值與準則「個人化」，進而引發政治極化。民眾會對不同意己方國家利益者出現「我者」與「他者」的認同或排斥。

愛國主義框架中另一個常見的元素是排斥敵對國家。例如將特定國家的政府或軍隊「妖魔化」(demonizing)。Dutta-Bergman (2006) 指出美國主流媒體在 2003 年美伊戰爭中，充當「美國政府的公關代理人」，透過對伊拉克政府的醜化與負面評論，達到為美國入侵辯護的目的。Anderson (2015, October 7) 也分析，2011 年爆發敘利亞內戰時，美國主流媒體使用大量的修辭排斥並醜化敘利亞總統阿薩德 (Bashar al-Assad) 政權。Brewer 則發現，

美國媒體經常順應美國政府的論述框架，將與美國外交政策不一致的外國領導人，例如南斯拉夫前總統米洛塞維奇（Slobodan Milošević, 1941-2006）、伊拉克前總統海珊（Saddam Hussein, 1937-2006），在報導中描繪成邪惡的存在（Brewer, 2006; Nelson et al., 1997）。

透過本節內容可以發現，愛國主義框架的使用程度，與消息來源是否為政府與菁英關係匪淺。而愛國主義框架體現的方式包括媒體展示母國「己方」的強大、媒體闡述母國對軍事行動擁有的正當性、在報導中試圖分化出「我者」與「他者」間的差距，以及展現出對「敵國」的排斥態度。本研究將參考以上文獻的愛國主義元素，並將之納入本研究，與媒體使用戰爭新聞學框架的情形一併進行分析與判斷。

而綜合愛國主義框架的上述觀點，本文作者也將其體現在兩岸衝突的報導面向並歸納成以下幾個面向，而這些面向也能呼應 Entman 的框架化過程。

在「定義問題」方面，媒體在愛國主義的框架下，會試圖指出兩岸衝突來自某國政府，而受到愛國主義框架影響，媒體試圖定義問題根源來自何者（某人、某國政府），也就如同 Schudson (2003) 所提到的「我者」與「他者」、Thetela (2001) 的「認同或排斥」。

同時，在「原因解釋」方面，受愛國主義影響，媒體會將某國在政治上姿態的不友好作為造成兩岸危機的主要原因，並傾向援引接近特定國家政府官方說法的。這與 Kellner (1992)、Rojecki (1999) 等學者提到是否以「我國為中心」的報導方向有關。

在「道德評估」方面，不同媒體會分別傾向於指責中共當局、臺灣政府在面對兩岸軍事衝突時解決方式不恰當，這對應到 Dutta-Bergman (2006) 等學者所言：是否在衝突中強調己方政府的正當性。

而媒體對於「解決方案」出現的分歧，則主要體現在是否應該以對立（或友善）的姿態面對中共軍事演習。Brewer (2006) 所提到醜化、排斥與我國對立的軍事政治實體相關。

綜合本節文獻，本研究提出以下四個研究問題：

- （一）了解臺灣四家主流媒體在 2020 年 8 月中共大規模軍演報導中，媒體報導類型、消息來源使用上是否出現差異，以及各媒體依賴官方消息來源的狀況。
- （二）了解臺灣四家主流媒體在 2020 年 8 月中共大規模軍演報導中，媒體使用戰爭或和平新聞學框架的傾向，並探究各媒體在框架使用上

的差異以及其意義。

- (三) 了解臺灣四家主流媒體在 2020 年 8 月中共大規模軍演報導中，是否出現愛國主義框架，並探究各媒體在此框架的使用上的差異以及其意義。
- (四) 了解臺灣四家主流媒體在 2020 年 8 月中共大規模軍演報導中的態度，包括是否展露對國際衝突中各方政府、軍事力量好惡，以及是否推斷衝突可能導致的戰爭結果。

參、研究方法

為了能具體且明確分析報導內容，本研究選擇使用內容分析法，以量化類目分析出新聞報導中的關鍵字、消息來源、形象描繪等差異。研究樣本為臺灣平面媒體中具代表性的四個媒體：（《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蘋果日報》）在 2020 年 8 月至 9 月中共軍演期間，對於兩岸軍事議題的相關報導。新聞文本來自漢珍數位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所經營的「臺灣新聞智慧網」，以及國立臺灣圖書館館藏中的紙本報紙。

本研究蒐集了 2020 年 8 月 14 日至 9 月 1 日中共軍演期間，臺灣四大平面新聞媒體對兩岸所有軍事新聞的相關報導。除了搜集中共軍事演習的報導，只要報導中涉及軍事，例如美國對臺軍售、兩岸衝突兵推、各國智庫或政界軍界人物分析或評論兩岸軍事情況的報導，都涵蓋其中。

而為了深入了解各家媒體的框架使用與立場，研究樣本也包括了報紙中的新聞分析稿件、社論與專欄部分，分析單位則使用新聞稿則數。所有註明獨立標題與作者的新聞文本，計為「一則」新聞。

研究資料類目包括三部份：（一）報導基本資料類目；（二）消息來源類目；（三）媒體框架與態度類目。

這三個類目分別對應框架化理論的不同部分。如前述 Entman (1993) 所指，消息來源引用、關鍵詞、描繪形象和文中主題相關的事實評判顯示出媒體不同的框架化過程。本研究報導的基本資料類目先呈現出媒體用了多少篇幅以及何種報導形式對兩岸衝突報導；消息來源類目呈現媒體在報導兩岸衝突時，使用了哪些類別、哪些國家別的消息來源；而媒體框架與態度類目，則是包含了報導中關鍵詞、描繪形象和文中主題的事實評判所形成的新聞框架和媒體立場。

(一) 報導基本資料的類目包括報導媒體、報導數量與報導形式。本研究將報導形式分為四類：純淨報導、新聞分析、專欄以及社論。純淨報導指直接報導客觀事實的新聞文本，屬於最傳統的新聞文體；新聞分析是媒體對於特定新聞事件的分析，結合了媒體與作者的新聞調查、解釋能力；專欄指媒體分配給特定專家或作者的報導欄位；社論是媒體讓各方讀者對報紙投稿進行評論與觀點陳述的欄位。專欄與社論的內容都會比新聞分析更具有主觀性，也能觀察出報社的立場。

而(二) 消息來源類目則包括消息來源類別和消息來源國籍。本研究將消息來源類別分為五大類，分別是官方消息來源、領域專家消息來源、媒體與網路媒體機構、民間消息來源和其他消息來源。消息來源國家別則按照消息來源國籍或其代表組織單位的國籍進行分類。「無法歸類的消息來源」則是完全匿名、也沒有標示出國家別的消息來源。

至於(三) 媒體框架和態度類目則包括報導中出現的戰爭新聞學或和平新聞學框架傾向、愛國主義框架傾向，和媒體態度。以下是筆者根據文獻檢閱內容，所整理出的媒體框架和態度類目指標：

本研究參考 Galtung (1986)、Lee & Maslog (2005) 戰爭新聞學／和平新聞學框架的內容分析指標，提出以下十個指標，用以分析臺灣四家主流媒體 2020 年 8 月中國大陸軍事演習的相關報導：

- (一) 消息來源菁英導向／消息來源人民導向。
- (二) 強調(敵我)差異／強調解決爭端。
- (三) 關注衝突當下現場／關注衝突原因和結果。
- (四) 好壞二分法／避免好壞標籤化。
- (五) 選擇站在衝突一方立場／不站在特定一方立場。
- (六) 偏袒(戰爭中)一方／無偏袒傾向。
- (七) 視戰爭為零和博弈／視戰爭存在雙贏可能。
- (八) 報導是否使用妖魔化語言。
- (九) 報導是否使用受害者語言。
- (十) 報導是否使用情緒化語言。

本研究另參考 Reynolds & Barnett (2003) 和 Schudson (2003) 等人的研究，提出四個研究指標，用以判斷報導中愛國主義框架是否顯著：

- (一) 較強調國軍(或美軍)的強盛／較強調共軍的強盛。
- (二) 強調國軍正當性／並未強調國軍正當性。

- (三) 在報導中使用「我」們／未在報導中使用「我」們。
- (四) 排斥與國軍對立的事物／並未排斥與國軍對立的事物。

最後，本研究參考前述對於新聞報導態度的相關文獻，提出下列兩個究指標，以判斷報導中涉及衝突各方的主觀好惡程度：

- (一) 認定共軍對臺構成威脅／認定共軍對臺不構成威脅。
- (二) 對中共持負面、質疑態度／對臺、美持負面、質疑態度。

除以上述指標進行量化的內容分析外，本文也在樣本中挑選出具代表性的案例數則，進行框架的質性分析，以深入探討軍事報導框架在新聞文本脈絡中如何運作。

同時，本研究訪問兩位臺灣新聞媒體中負責報導國際政治、軍事新聞的記者（記者 A、記者 B），以驗證研究中對框架的假設和推論是否符合實務現況。兩位記者的背景資料（表 1）和訪問問題（表 2）如下：

表 1：受訪者背景資料

	媒體產業	負責新聞業務	從業經驗
記者 A	電視新聞媒體	國際政治、軍事外交、播報口譯	約 3 年
記者 B	電視新聞媒體	國際政治、軍事外交	約 4 年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本研究的訪問問題如表 2，問題內容主要立基於兩個基礎。一是 Entman (1993) 對框架的詮釋「定義問題、原因解釋、道德評估、解決方案」是否足以解釋新聞媒體處理新聞議題的工作流程；二是針對本研究所提出的幾個研究問題與相關結果進行提問，包括：報導方式、消息來源、戰爭／和平新聞學、愛國主義和媒體在報導中顯現出的立場。

表 2：訪問問題列表

訪問問題一	你認為平面媒體對國際新聞的報導形式（純淨報導、新聞分析、社論和專欄等）差異，會如何影響媒體對兩岸衝突議題的新聞框架和立場差異？
訪問問題二	你認為框架化理論中的「定義問題、原因解釋、道德評估、解決方案」，是否可以解釋媒體兩岸衝突報導中的框架和立場差異？
訪問問題三	你認為媒體對消息來源的使用，如何影響兩岸衝突新聞報導中出現的框架和立場差異？
訪問問題四	你在新聞工作中，是否感受到戰爭（衝突）、愛國主義等元素，和媒體立場有強烈關聯？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肆、研究結果

一、四報報導數量、消息來源、框架數量的統計

研究信度檢驗方面，本研究邀請新聞業界的外電編譯一位，作為編碼員。研究者與編碼員對隨機抽樣的 20 則研究文本（占總樣本數 404 則約 5%）進行內容分析前測。根據 Krippendorff Alpha 檢定結果的 Kalpha 值，若研究類目 Kalpha 值高於 0.67 則認為可信性適當，得以作為初步研究結果（Beckler, et al., 2018; Carletta, 1996），研究者會將該類目予以保留；未達此值的類目則代表其代表性不足，予以修改或刪除。

前測結果顯示，包括戰爭／和平新聞學框架（五個指標，包括菁英或人民消息來源、強調敵我差異或解決爭端、關顧衝突現場或衝突原因、好壞二分法或避免標籤化、以及零和博弈或雙贏）、愛國主義框架（四個指標）、媒體對中共是否持負面態度（一個指標）以及媒體是否認定美軍會協防臺灣（一個指標），上述十一個指標的 Kalpha 值均高於 .67，其中八項 Kalpha 高於 .80。而所有項目的相互同意度都在 0.85 以上，信度也都在 0.93 以上。整體相互同意度達到 0.89，信度達 0.95，研究者認為符合研究信度要求，因此採用以上分析類目進行內容分析。

作者得出所有統計結果後，除以文獻檢視各表格的結果之外，為了加強此研究與新聞實務界的連結，也訪問業界國際、軍事新聞記者，解讀部分表格數字的意義。

第一個研究問題探究中國軍演報導的類型和消息來源的差異。首先概述報導篇數。軍演新聞報導共計 404 篇。其中《中國時報》以 145 篇（佔 35.9%）最多，數量最少是《聯合報》，僅有 75 篇報導（佔 18.6%）（表 3）。

表 3：各報報導篇數統計

報別	報導則數	所佔百分比 (%)
聯合報	75	18.6
中國時報	145	35.9
蘋果日報	86	21.3
自由時報	98	24.2
總數	404	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表 3 報導則數可以直觀地反應出新聞媒體對中國軍演新聞事件的重視報導，也直接反映出新聞媒體試圖「定義問題」。報導數量和篇幅都可以定義並呈現出媒體所關注的問題，並預示閱聽人「哪些問題重要」，因此從報導數量可看出媒體定義問題的輕重。本研究新聞文本收集的時間僅兩周，各報的報導總數突破 400 則，這顯示出兩岸衝突新聞被主流媒體定義為非常重要的新聞。

在報導類型方面，各報的報導形式與分佈比例顯示，中共軍演多數為純淨新聞報導，共有 245 篇，佔總數的 60.6%；其次是社論 88 篇，佔 21.8%；專欄共 43 篇佔 10.6%；而數量最少的是新聞分析，共有 29 篇，佔 7.1%。《聯合報》的社論總數最少（75 篇），而純淨報導的比例最高，佔 73.3%（55 篇）；純淨報導比例最低的是《自由時報》，共佔 53%（52 篇）。新聞分析是各報都較少見的報導形式，佔比 6.9%（28 篇）。《聯合報》的新聞分析比例最高，佔 10.7%（8 篇），其次為《中國時報》7.6%（11 篇）、《自由時報》7.2%（7 篇），《蘋果日報》則佔比最少 2.3%（2 篇）。專欄比例最高的是《蘋果日報》，佔 16.3%（14 篇），最低為《自由時報》2%（2 篇）。社論最多的是《自由時報》佔 37.8%（37 篇），《聯合報》5 篇最少，僅 6.7%（表 4）。

即便多數媒體報導都以純淨新聞為主，但各家媒體的報導數量仍有差異：《聯合報》高比例的純淨新聞報導比例，加上其較低的報導則數，顯示其在問題定義上未將兩岸衝突定義為非常重要的問題；反觀報導數量最多的《中國時報》使用了大量的新聞分析、專欄、社論（共 43.5%）報導新聞議題，可見其不但將兩岸衝突看作重要的議題，其定義問題的主觀性也強，報導數量第二多的《自由時報》也有明顯相似的傾向。

表 4：各報報導類型統計

報別	純淨報導	新聞分析	專欄	社論	各家媒體加總
聯合報	55 (73.3%)	8 (10.7%)	7 (9.3%)	5 (6.7%)	75 (100.0%)
中國時報	82 (56.5%)	11 (7.6%)	20 (13.9%)	32 (22.0%)	145 (100.0%)
蘋果日報	56 (65.1%)	2 (2.3%)	14 (16.3%)	14 (16.3%)	86 (100.0%)
自由時報	52 (53.0%)	7 (7.2%)	2 (2.0%)	37 (37.8%)	98 (100.0%)
總數	245 (60.6%)	28 (6.9%)	43 (10.6%)	88 (21.8%)	404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⁴

4 本刊編輯註：依本刊體例，小數點數字採四捨五入；本篇各表（包括從表 4 起至表 10）數值為研究者提供，總數略有出入，不一定完全吻合 100%，特此說明。

表 4 的各報報導類型，訪談主跑軍事的記者 A。A 表示，不同報導類型關乎媒體如何討論其所報導的議題，而越是想要「帶風向」或影響意見輿論市場的報導就會使用越多的新聞分析、社論和專欄。

換成是電視或多媒體新聞也一樣！只是新聞分析、社論和專欄會被改成新聞在螢幕上的敘事邏輯，和一些新聞評論、政論節目（記者 A）。

而另一家媒體的軍事記者 B 則指出，專欄和社論都是媒體採納較符合報社立場、較激進的特定人士言論所形成的版面，因此使用這些報導比例越高代表媒體的主觀性越強。他還指出，即便媒體使用純淨報導，仍可發揮上述定義問題等作用，只是力道較輕微，但仍可透過報導中只呈現「部分真實」的內容達到相同的目的。

在消息來源類型方面（表 5），各家媒體的消息來源都以官方消息來源為主，經卡方檢定，不同媒體與消息來源類別的使用沒有顯著的相關性（ $\chi^2 = 20, df = 16, p > .05$ ），顯示四個媒體均高度仰賴官方消息來源，佔消息來源總數的 53.5%。其中以《聯合報》最重視官方消息來源，佔其消息來源總數的 62%（145 位）；《蘋果日報》最少，49.1%（130 位）。

表 5：各報消息來源類型統計

報別	官方消息 來源	領域專家 消息來源	媒體與網路 媒體機構	民間消息 來源	不可辨識 或其他
聯合報	145 (62.0%)	43 (18.4%)	33 (14.1%)	7 (3.0%)	6 (2.6%)
中國時報	229 (51.7%)	106 (23.9%)	70 (15.8%)	27 (6.1%)	11 (2.5%)
蘋果日報	130 (49.1%)	73 (27.5%)	48 (18.1%)	10 (3.8%)	4 (1.5%)
自由時報	140 (53.4%)	89 (34.0%)	23 (8.8%)	6 (2.3%)	4 (1.5%)
總數	644 (53.5%)	311 (25.9%)	174 (14.5%)	50 (4.2%)	25 (2.1%)

$\chi^2 = 20, df = 16, p > .05$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領域專家消息來源佔所有消息來源 25.9%（311 位），是第二多的消息來源。《自由時報》34%（89 位）佔比最多，《聯合報》18.4% 佔比最少（43 位）。

媒體與網路媒體機構佔全部消息來源的 14.5%（174 位）。《蘋果日報》18.1%（48 位）比例最高，《自由時報》8.8%（23 位）最低。

民間消息來源佔全部消息來源 4.2%（25 位），是可辨識消息來源中最少的。《中國時報》6.1%（27 位）最多，《自由時報》2.3%（6 位）最少。

不可辨識或其他消息來源佔 2.1%（25 位），在各家媒體的佔比都最少，最多的是《聯合報》2.6%（6 位）。對消息來源使用的分析，將會在下方（表 6）一併討論。

以消息來源國家別而言（表 6），來自臺灣的消息來源佔最多，約達所有消息來源的一半，經卡方檢定，媒體別與消息來源國家別之間的關聯性並不顯著（ $\chi^2 = 12, df = 9, p > .05$ ）。臺灣消息來源佔 50.5%（608 個）；其次中國和美國的消息來源數量，都佔總數的 22.6%（272 個）；其他消息來源國家則佔 3.5%（42 個），主要來自日本、澳大利亞、英國等國家；無法歸類消息來源僅佔 0.8%（10 個）。

臺灣消息來源的使用中，以《自由時報》57.3%（150 個）佔比最高，《中國時報》最少 48.1%（213 個）；中國消息來源中，以中國時報 26.2%（116 個）最高，《自由時報》16%（42 個）最少；而美國消息來源在《蘋果日報》和《自由時報》都佔 22.9%（64 個）最多，《聯合報》21.4%（50 個）最少。

媒體使用的消息來源是媒體在框架化過程中定義問題、原因解釋的重要依據。不同身份別、國家別的消息來源，會從不同的角度與立場定義問題，尤其是在原因解釋上，將形成問題的根源指向消息來源母國的敵對國家。

表 6：各報消息來源國家別統計

報別	臺灣	中國大陸	美國	其他或無法歸類
聯合報	116 (49.6%)	55 (23.5%)	50 (21.3%)	13 (5.6%)
中國時報	213 (48.1%)	116 (26.2%)	98 (22.1%)	16 (3.6%)
蘋果日報	129 (48.7%)	59 (22.3%)	64 (22.9%)	13 (5.0%)
自由時報	150 (57.3%)	42 (16.0%)	60 (22.9%)	10(3.8%)
總數	608 (50.5%)	272 (22.6%)	272 (22.6%)	52 (4.3%)

$\chi^2 = 12, df = 9, p > .05$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針對表 5、6（消息來源類型與消息來源國及別），記者 A 進一步解讀，媒體報導時展現出對議題的定義問題、原因解釋、道德評估、解決方案，都會與消息來源觀點高度一致。因此，媒體站在「哪一類人」（消息來源類型）和「衝突中哪一國」（消息來源國及別）角度看問題，與報導會呈現出的框

架、立場偏差至關重要。

有時候國際衝突可引用的消息來源寥寥無幾，通常本就都是官方機構才可能有第一手資料，因此消息來源在類型和國家別上，各媒體確實可能差異不至於太大（記者 A）。

這可呼應本研究中各媒體間的消息來源差異，也確實都呈現不顯著的差異。

至於記者 B 則指出，自己經驗中記者撰寫的內容八成以上都來自消息來源，尤其是純淨報導更幾乎通篇都是消息來源陳述的內容。因此使用哪些類型、國家別消息來源對於媒體報導的角度有決定性的影響。

消息來源本身就能用自己的傳播技巧，向記者定義問題、原因解釋、道德評估、以及解決方案。即便記者試圖僅部分採納其言論，但手上握有的報導材料也有限，在截稿時間等外界壓力下，必然還是會妥協（記者 B）。

第二個研究問題則分析四個媒體的戰爭或和平報導框架差異。經卡方檢定，媒體別與戰爭新聞學 / 和平新聞學的使用關聯性達顯著水準 ($\chi^2 = 99.877, df = 3, p < .05$)，各媒體使用戰爭新聞學或和平新聞學的框架有顯著差異。在 404 則有效樣本中，使用戰爭新聞學框架的報導佔 66.3% (268 篇)，和平新聞學則佔 33.7% (136 篇)。《聯合報》使用戰爭新聞學框架達 65.3% (49 篇)，和平新聞學則有 34.7% (26 篇)。而《中國時報》的戰爭新聞學框架有 37.2% (54 篇)，和平新聞學框架則高達 62.8% (91 篇)，是四報中唯一使用和平新聞學框架多於戰爭新聞學框架的媒體。《蘋果日報》採用戰爭新聞學框架 89.5% (77 篇)、和平新聞學 10.2% (9 篇)；《自由時報》戰爭新聞學框架 89.8% (88 篇)、和平新聞學框架 10.2% (10 篇)，戰爭新聞學框架的傾向在各報中最為明顯（表 7）。

表 7 中呈現的戰爭新聞學 / 和平新聞學框架，可謂與戰爭新聞學指標與 Entman (1993) 的框架化理論元素高度符合。兩相對照下：這些指標包含了新聞中的關鍵詞（是否強調敵我差異、受害者語言、情緒化語言）、消息來源（消息來源菁英或平民導向）、描繪形象（是否好壞二分法、妖魔化語言）、文中主題的事實評判（是否選擇站在衝突一方立場、視戰爭為零和博奕）等，也可見戰爭新聞學的指標足以判定框架化過程如何在國際衝突中運作，而兩岸軍事新聞最主要的元素確實就是『衝突』。

表 7：各報戰爭新聞學或和平新聞學框架

報別	戰爭新聞學	和平新聞學
聯合報	49 (65.3%)	26 (34.7%)
中國時報	54 (37.2%)	91 (62.8%)
蘋果日報	77 (89.5%)	9 (10.5%)
自由時報	88 (89.8%)	10 (10.2%)
總數	268 (66.3%)	136 (33.7%)

$\chi^2 = 99.877, df = 3, p < .05$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我們常要搜尋衝突兩方國家領導人和政府官員的立場上鮮明對立的說法，這樣的火藥味會讓新聞變得簡單明瞭，也才會吸睛（記者 B）。

戰爭新聞學的指標確實足以對應到框架化過程中涉及的元素，而很多框架指標正可以從報導中的關鍵字尋找並定義。例如《自由時報》報導〈共軍才嗆臺海軍演 美艦現東沙〉（涂鉅旻、呂伊萱，2020 年 8 月 17 日）中，強調中國與臺灣間的敵我差異、好壞二分法、站在衝突一方立場、視戰爭為零和博弈等元素，都體現在其對中方的描述和用字如「共軍『嗆』臺海軍演」、「利用民主體制打擊民主」等。而文中試圖展現臺灣和美國友好的文字「臺美關係升溫之際」、「白宮推文『挺臺』」、「臺灣在美國與冠狀病毒對抗之際，給予『慷慨支持與合作』」等關鍵字與描繪形象，也同樣在加深這些衝突與對立。

值得注意的是，過去國內外調查報告（黃紀，2021；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2022）均顯示與臺灣其他媒體相較，《中國時報》和《聯合報》是傾藍的政治立場。而表 7 呈現出《中國時報》有超過六成（62.8%）的報導傾向以和平新聞學的框架報導臺海軍事衝突，顯現出中時在臺海衝突報導中強調菁英消息來源、解決兩岸爭端、避免報導衝突現場、避免好壞的標籤化、以及強調雙贏等。而《聯合報》在臺海衝突報導中則超過六成（65.3%）傾向以戰爭新聞學的框架報導臺海戰爭，與過去的調查顯示出的既定印象有所不同。

第三個研究問題分析各媒體的愛國主義框架。404 個有效樣本中，愛國主義框架明顯的報導佔 56.7%（229 篇），而不明顯則佔 43.3%（175 篇）。卡

方檢定結果顯示，各媒體採用愛國主義框架報導的差異達到顯著水準，顯示各報在愛國主義框架的使用上差異很大 ($\chi^2 = 138.935, df = 3, p < .05$) (表 8)。

《聯合報》有 44% (33 篇) 的報導明顯使用愛國主義框架，56% (42 篇) 則不明顯，是兩種框架傾向較為接近的媒體。《中國時報》愛國主義框架明顯者佔 23.4% (34 篇)、不明顯則高達 76.6% (111 篇)，整體而言可謂高度傾向不採用愛國主義框架進行報導。而《蘋果日報》明顯者佔 87.2% (75 篇)、不明顯 12.8% (11 篇)；《自由時報》明顯者則達 88.8% (87 篇) 顯著、不顯著 11.2% (11 篇)，這顯示出《自由時報》是中共軍演新聞報導中，戰爭新聞學和愛國主義框架都是最顯著的媒體。關鍵詞、描繪形象、文中主題的事實評判，構成了研究中對戰爭新聞學、愛國主義框架的類目。

表 8：各報愛國主義框架差異

報別	愛國主義框架明顯	不明顯
聯合報	33 (44.0%)	42 (56.0%)
中國時報	34 (23.4%)	111 (76.6%)
蘋果日報	75 (87.2%)	11 (12.8%)
自由時報	87 (88.8%)	11 (11.2%)
總數	229 (56.7%)	175 (43.3%)

$$\chi^2 = 138.935, df = 3, p < .05$$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表 8 所呈現的愛國主義框架，可謂與戰爭新聞學的指標高度相關，例如對媒體母國敵對勢力的「不正當」觀點可對應到戰爭新聞學中的「妖魔化」。這些指標在框架化過程中對於「敵我」間的描繪形象、文中主題的事實評判有明顯的著墨，藉以深化媒體各自的主觀立場。

記者 B 進一步指出，以軍事報導而言，愛國主義的新聞報導方式本來理應存在於所有新聞媒體中。即便愛國主義框架使用比例最低的《中國時報》也依然如此。

這與此媒體認定的「國」為何高度相關。可能《中國時報》認定自己才是「愛國」，只是愛的國並非「臺灣」而是中華民國、中國。但在框架指標中，他們「愛國」的報導形式無法被辨識出，或至少他們是質疑民進黨政府的。但反面而言，他們會認為質疑民進黨政

府是在指出錯誤的政策，這也是愛國主義（記者 B）。

以《中國時報》（76.6%）與《聯合報》（56.0%）的報導而言，此結果也顯示出在臺海衝突的報導中這兩個媒體並不排斥與國軍對立的事物、也未在報導中經常使用「我們」的主體召喚、並較為強調共軍的正當性等框架。

第四個研究問題探討媒體在報導軍演新聞時，是否會對涉及到臺海衝突的各方國家、政權、政要人物與其軍隊展現出主觀好惡或負面態度？以臺海軍事衝突為例，本研究發現，各媒體對「美軍是否會協防臺灣」的報導出現明顯差異（ $\chi^2 = 93.505, df = 6, p < .05$ ）。44.3%（179 篇）的報導認為臺灣能在臺海戰爭中有效防衛，而 35.4%（143 篇）認為臺灣無法有效防衛。約有 2 成（20.3%，82 篇）報導沒有針對這個問題表態。

對此問題態度最明顯的是《中國時報》，有 61.4%（89 篇）認為臺灣不能在軍事上有效防衛，僅 21.4% 的報導（31 篇）認為臺灣可以。態度較持平的是《聯合報》，其中 34.7%（26 篇）認為可以有效防衛、37.3%（28 篇）認為不能，不能有效防禦的比例略高有能力防禦（表 9）。

表 9：各報對「若中共武力犯臺，美軍是否會協防臺灣？」

報別	認定國軍、美軍能在兩岸衝突中有效防衛臺灣	認定不能有效防衛臺灣	無法判定
聯合報	26 (34.7%)	28 (37.3%)	21 (28.0%)
中國時報	31 (21.4%)	89 (61.4%)	25 (17.2%)
蘋果日報	58 (67.4%)	10 (11.6%)	18 (21.0%)
自由時報	64 (65.3%)	16 (16.3%)	18 (18.4%)
總數	179 (44.3%)	143 (35.4%)	82 (20.3%)

$\chi^2 = 93.505, df = 6, p < .05$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至於媒體是否對中共或臺灣或美國政府展現負面態度？研究結果顯示（表 10），絕大多數（92.3%，佔 373 篇）的報導均顯露出對特定國家的態度，經卡方檢定結果顯示，不同媒體顯露的態度差異達到顯著水準（ $\chi^2 = 174.343, df = 6, p < .05$ ）。其中對中共表達負面態度報導佔多數（達 54.4%，220 篇），37.9%（153 篇）對臺灣或美國政府表達負面態度，7.7% 的報導（31 篇）則無法判定。

《自由時報》有高達 90.8%（89 篇）展現對中共的負面態度，僅 6.1% 報導（6 篇）對臺灣或美國政府呈現負面態度。《中國時報》對臺、美政府負面態度則高達 69.7%（101 篇），居全部媒體之冠，而對中共負面或質疑態度則僅有 19.3%（28 篇），是全部媒體最低者。

表 9（媒體認定若中共武力犯臺，美軍是否會協防臺灣？）與表 10（媒體對中共／臺、美政府與軍隊持負面或質疑態度）是針對臺灣獨有的國際情境和軍事新聞報導環境所設計。本文認為因為臺灣與中國大陸之間有統獨問題，且是全球最重要的國際衝突潛在處，因此美國對於臺灣的軍售、戰爭援助，甚至是對於發生戰爭後中、美的動作，都成為判斷媒體立場分歧的重要指標。其中「媒體對中共、臺、美政府與軍隊是否持負面或質疑態度」，攸關框架化過程的定義問題、道德評估，「媒體是否認為美軍會協防臺灣？」則較傾向框架化的原因解釋、解決方案。

表 10：各報是否對中共／對臺、美政府與軍隊持負面或質疑態度

報別	對中共政府與軍隊持負面或質疑態度	對臺、美政府與軍隊持負面或質疑態度	無法判定
聯合報	28 (37.3%)	40 (53.3%)	7 (9.3%)
中國時報	28 (19.3%)	101 (69.7%)	16 (11.0%)
蘋果日報	75 (87.2%)	6 (7.0%)	5 (5.8%)
自由時報	89 (90.8%)	6 (6.1%)	3 (3.1%)
總數	220 (54.4%)	153 (37.9%)	31 (7.7%)

$$\chi^2 = 174.343, df = 6, p < .05$$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記者 B 補充指出，兩岸衝突議題存在太多複雜的歷史因素，加上中美在經濟和軍事政治上爭霸的背景，導致表 9、10 中的兩個問題成為不同立場媒體間必然出現分歧的議題：

舉例而言，在兩岸衝突問題上「原因解釋」不同，造成偏統派、藍營媒體通常認定美國是兩岸關係的源頭，也就是混亂製造者，因此對美國採負面和質疑態度，也認定美國不可能在兩岸出現大型衝突時介入導致國家利益受損；相對的，偏臺灣主體性的媒體則會對中國持負面態度，並認定美國會協防臺灣。即便這些媒體本身不一

定相信美國會協防臺灣，但在媒體報導上仍會試圖灌輸其讀者類似觀念（記者 B）。

另外，表 10 研究的雖是 2020 年 8 月的中國解放軍軍演，但本文作者以及受訪記者觀察 2022 年裴洛西訪臺之後中國頻繁對臺軍演，國內主流媒體對臺海未來萬一發生戰爭，美軍是否會援臺的報導立場，與本文的研究結果相去不遠。親藍媒體仍呈現出明顯的所謂「疑美論」，而親本土立場的媒體則仍持續相信美國。

二、軍事報導框架的質性分析

除了以統計結果回答本研究的研究問題之外，本研究也試圖根據戰爭新聞學或和平新聞學以及愛國主義的框架特徵，選取實例進行質性分析，以進一步佐證統計分析的結果。

以《聯合報》8 月 13 日的報導〈1995、96 年臺海危機以來，緊張再現，共軍挑明對臺軍演〉為例（陳言喬等人，2020 年 8 月 13 日），可以觀察到明顯的戰爭新聞學框架。

以消息來源而言，本篇報導非常側重菁英消息來源，包括大陸環球網、前總統馬英九、行政院長蘇貞昌、北京大學海洋研究所、解放軍東部戰區發言人張春暉、美國太平洋艦隊等。上述六個消息來源包含特定國家政府、國防軍事單位、研究機構、專家學者與媒體，沒有一般人民。

而此報導的消息來源引用非常強調兩岸衝突，例如引用中國人民解放軍東部戰區發言人，指出：

近來『個別大國』（暗指美國）在臺灣問題上消極動向不斷，向臺獨勢力發出嚴重錯誤信號，嚴重威脅臺海地區和平與穩定。（轉引自陳言喬等人，2020 年 8 月 13 日，1 版）。

一方面也同時嚴厲批評臺灣大陸事務委員會的說法：

共軍近期對臺針對性的軍演，是破壞臺海和平，危害臺灣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挑釁行徑，我方絕不妥協。（轉引自陳言喬等人，2020 年 8 月 13 日，1 版）。

這段內文明顯強調軍演事件的衝突性。

報導中也重視零和博弈的概念，例如明確引用中共和臺灣官方在國防上不退讓的堅定說法，也引用解放軍說法指出：「臺灣是中國領土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演習目的是）維護國家主權需要採取的必要行動」。同時引用臺灣國防部指出「我方絕不妥協」、「有效確保臺灣國家安全、捍衛臺灣主權」，皆顯示零和博弈特質的報導方式大於存在雙贏可能的報導方式。

不過另一方面，此報導也關注衝突原因和結果。例如文中指出美國衛生部長「阿查爾來臺，中共不滿」，是造成此次中共軍事演習的原因。文章開頭也把觀察國際衝突的時間軸拉長，指出「這是自一九九五、九六年臺海危機以來，共軍少見直接宣布的對臺軍事演習」。可見本篇報導仍有嘗試從和平新聞學的角度進行報導。

在貼「好壞標籤」的面向上，Galtung (2002) 的研究曾指出，媒體是否對國際衝突中特定一方貼上「好壞標籤」是判斷戰爭或和平新聞學的重要指標，標籤能用以指出一方為邪惡製造者或問題核心（胡光夏，2008）。本篇報導（陳言喬等人，2020 年 8 月 13 日）並沒有明確使用好壞二分法對中、美臺任何一方政府進行評價，但報導中「（美國）向臺獨勢力發出嚴重錯誤信號，嚴重威脅臺海地區和平與穩定」引用了中共的官方說法指責臺灣和美國政府，也引用了臺灣國防部說法指責中共「破壞臺海和平」、「危害臺灣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挑釁」等話語，可見報導者試圖平衡地指出雙方皆是問題製造者，以避免直接進行好壞的標籤化。

本研究經過內容分析發現《中國時報》是四個媒體中使用和平新聞學框架最多者，以 8 月 14 日的報導為例〈陸美對抗升級 旺旺中時民調顯示年輕人高達 7 成 2 贊同 加強兩岸交流 躍主流民意〉（朱真楷、趙婉淳，2020 年 8 月 14 日），和平新聞學的傾向就非常明顯。

首先，本篇報導消息來源也偏向菁英消息來源，來源包括旺旺中時民調、國民黨、中國人民解放軍東部戰區發言人張春暉。

而報導中呈現顯著的和平戰爭框架，強調解決爭端。例如報導中指出：「高達 5 成 8 的民眾認為當前兩岸應『加強交流』」、「在 20～29 歲的年輕人，有高達 72.4% 認為應『加強交流』」。

此報導中也同樣關注衝突原因和結果，例如提到此次軍演的國際情勢背景：「陸美關係風雲激盪，兩岸政治僵局持續對立」、「面對當前詭譎多變的陸美軍事較量與敏感的臺海變局」，但文章通篇沒有關注衝突當下現場的敘

事出現。

不過此報導並未對共軍進行好壞二分法，也沒有顯露出對共軍的負面情緒，反而較偏向指責媒體母國政府，例如指出「蔡英文政府執政以來，兩岸政治關係持續降溫」。

此外，報導中明確顯示出兩岸存在雙贏的可能性，例如「海峽兩岸以和為貴」、「應該『交往對話』才能化解對立」、「使用武力只會加深裂痕，製造仇恨」、「臺灣主流民意仍是期待兩岸加強交流與對話」，都一再試圖凸顯兩岸還有談判以及和平解決爭端的空間，並非一定要持續走向軍事衝突。

但《蘋果日報》同日的報導〈又武嚇！共軍宣布臺海南北兩端實戰演練〉（王炯華、陳培煌，2020年8月14日）則呈現不同的樣貌，戰爭新聞學的傾向明顯。例如報導關注衝突當下現場，著重軍演事件當下的兩岸敵對態度。在好壞標籤的面向上，報導則具有明顯的好壞二分傾向，明確以「武嚇」形容共軍軍事演習。

而在零和博弈的面向上，報導對兩岸的態度描述也顯現出零和博弈的氛圍，例如稱臺灣國軍「有能力也有決心捍衛國家安全」，而解放軍機越過海峽中線則是對「對阿薩爾訪臺的『清晰回應』」。

而類似《蘋果日報》的報導，《自由時報》的報導也顯現出明顯的戰爭新聞學框架。例如〈共軍叫囂臺海軍演，我軍方：恐嚇大於實質〉（吳書緯、鍾麗華，2020年8月14日），報導強調兩岸衝突，先後分別引用解放軍發言人說法，稱要「在臺灣海峽及南北兩端連續組織實戰化演練」；接著又引用臺灣國防部稱國軍「對於臺海周邊情勢以及海、空域動態，均有嚴密掌握」，皆強調兩岸的衝突面向。

此報導也關注衝突當下現場，報導中提及臺灣國軍「對於臺海周邊情勢均有嚴密掌握」，較為關注衝突當下現場，但未提及造成衝突的地緣政治與長遠的國際關係。

另外，此報導中的好壞標籤二分法相當明顯，例如稱中共的軍演行為是「恐嚇」，同時也引用國防資深官員稱中共「宣傳做很大」，意指中共意圖虛張聲勢，是衝突中邪惡的一方，也是製造問題的一方。

除了戰爭新聞學或和平新聞學的框架分析，本研究在內容分析時也發現上述框架經常伴隨軍事報導中的愛國主義框架同時出現。試舉以下幾個例子做進一步的分析。

以各報對於同一事件的報導而言，例如8月24日各報對「AIT處長參

與金門 823 公祭」的報導為例，各報報導中，《聯合報》的愛國主義框架使用狀況較為持平，而《中國時報》的愛國主義框架則非常不顯著，但《蘋果日報》與《自由時報》則是十分顯著。

以《聯合報》8 月 24 日報導〈蔡赴金門追思 823 AIT 處長陪祭〉為例（程嘉文，2020 年 8 月 24 日），此報導強調國軍或美軍的強盛，引用總統府發言人說法：「感謝美國友人參與，共同為區域和平穩定貢獻努力」，指出「國軍有信心也有能力迫使敵人犯臺失敗」，一方面也展示臺美關係緊密以致軍事能力強盛。此外更直言國軍本身已做好軍事防禦的準備。在強調國軍或美軍正當性的面向上，報導中「感謝美國友人共同為區域和平穩定貢獻努力」、「國軍迫使敵人『犯臺』失敗」、「當年浴血奮戰，今天的『民主自由』」，都在強調國軍和美軍在歷史上（823 砲戰）和當下的正當性。報導也意指國軍的軍事行動、與美方的軍事合作都是基於維護區域和平、臺灣民主的作為。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報導中未使用「我們」，而是使用「我」一詞，是引述蔡英文總統說法中所使用。「我」指的是蔡總統本人，而非「我國」或「我軍」，顯示出《聯合報》對此事件的報導，並未強調軍事新聞中的我者（我軍）與他者（敵軍），也未試圖召喚國家人民的歸屬感。

《蘋果日報》同日報導〈囂張！共機趁蔡返臺挑釁 3 小時〉（蘋果日報，2020 年 8 月 24 日），則呈現明顯的愛國主義框架。例如強調國軍或美軍的強盛，稱美國「告誡北京別盲動」，甚至稱共軍演習「之前就傳出讓美方很火大」。文章還引用兩位臺灣學者，分別稱「美國支持臺灣，雙方的關係十分緊密」、「美方正極力提升臺灣防堵中共擴張的戰力」，明顯強調美軍的強盛。另外也強調臺灣國軍或美軍的正當性，例如報導標題首先就使用共軍「囂張」、「挑釁」等字眼。內文也強調美國（AIT）是臺灣的「真朋友」，並指責共機繞臺和軍演，更直言臺灣國軍派出戰機飛至外島，其正當性在於「確保（臺灣總統）專機安全」。

報導中有使用「我」以及「我們」，包括引用 AIT 說法「美臺安全合作讓『我們』引以為傲」、「中國人民解放軍昨中午疑似派偵察機在『我』防空識別區」繞行，並直接引用空軍司令部稱蔡總統專機為「我總統專機」，皆可顯見報導中對己方國家人民歸屬感的召喚。

在《自由時報》報導〈金門紀念 823 AIT 處長首出席 鄭英傑悼『聯臺抗中』殉職美軍〉（呂伊萱、吳正庭，2020 年 8 月 24 日）一文中，也可觀察到明顯的愛國主義框架。例如報導臺灣國軍或美軍的強盛，回顧了 823 砲戰

時，臺灣在美援下成功守衛金門、連江地區，試圖強調國軍和美軍之間的長期合作關係與綜合軍事實力強盛，有能力聯手抗中。同時也引述臺灣國安幕僚，稱中共軍演後：

傳出美方很火大，甚至在中國宣傳加大對臺威脅時刻，美軍就輪番在南海與東海進行大規模軍演（轉引自呂伊萱、吳正庭，2020年8月24日，1版）。

同時，報導則排斥與臺灣國軍對立的事物，如報導標題就稱美國要「聯臺抗中」，並在內文使用「抵禦」和「防守」等詞，排斥共軍。

此則報導也凸顯臺灣國軍或美軍的正當性，將美國與臺灣的關係形容為「真朋友，真進展」，並指出當年有美軍士兵曾「與臺灣同袍一同抵禦中華人民共和國」、「接下來的臺美軍演、聯合防守和分工合作等發展將值得期待」。這些報導語彙都顯示出臺美的軍事動作是為了「抵禦」侵略、「防守」國土與主權。

然而《中國時報》的報導則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愛國主義框架。例如在〈陸學者稱 AIT 姿態性演出 非官方〉（許依晨，2020 年 8 月 24 日）此篇報導中，強調共軍的強盛。報導引用大陸學者的說法，強調美軍對臺灣的友好動作只是「黑幫老大罩著小弟」、讓臺灣「增加安全感」。即便其對美軍的強盛並未否定，但明顯不看好臺灣國軍的強盛、以及美國在政治和軍事上對臺灣的援助。

此外，報導中並未承認臺灣國軍或美軍的正當性，卻大量引用中方立場指責美國與臺灣外交關係，如稱「AIT 處長鄭英傑『姿態性』參加活動」、「民進黨現在又回到 62 年前，做出重新走向對抗的舉措」等。報導中也幾乎沒有引用國軍或美軍的說法，明顯並未排斥與臺灣國軍對立面的人事物。報導中未使用「我」一詞，引述的消息來源也多數是大陸學者。

伍、研究結論與限制

本研究發現，臺灣的主流平面媒體在報導軍事新聞時，對於戰爭新聞學框架的呈現、愛國主義框架的使用，以及媒體對中美的好惡立場、對國際衝突結果評判，均出現顯著的差異。唯有在消息來源的使用上，各媒體不論是消息來源類型還是消息來源國家別均未呈現顯著差異。

本研究以量化以及質性研究印證，戰爭新聞學以及愛國主義框架盛行於多數主流媒體的軍事報導，與過去 Chung et al. (2014)、Fong & Koon (2019)、Hussain & Siraji (2018)、Lee & Maslog (2005) 等學者的研究結果一致。多數主流媒體經常採用戰爭新聞學框架進行軍事報導，並對假想敵國持負面態度，且站在愛國主義、與其母國政府相近立場。同時，臺灣主流媒體的軍事新聞報導中戰爭新聞學和愛國主義框架的使用，兩者經常伴隨出現。主要的例外出現在《中國時報》的新聞報導，在兩岸軍事衝突中經常強調和平新聞框架，且在報導中很少凸顯愛國主義框架。

臺灣身處於全球最重要的軍事衝突潛在地區，卻因複雜的政治因素和媒體立場，讓國內主流媒體的報導出現歧異的報導框架、報導方式以及報導的態度。這樣的結果也令人關切，臺灣不同族群的閱聽人所接收到的軍事資訊是否會出現截然不同的感知和理解。

2022 年 2 月，俄羅斯入侵同為前蘇聯加盟國的烏克蘭。這不但深刻影響中美貿易戰以來越來越壁壘分明的全球國際關係格局，也讓與中共之間有複雜歷史、國家主權關係的臺灣，再度成為國際焦點。2022 年 8 月 2 日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臺，更超越前述的美國衛生部長艾薩和國務助卿 Keith Krach，成為近六十二年訪臺最高層級的美國官員。

面對此情況，中國人民解放軍不但立刻於 8 月 4 日至 7 日舉行完全包圍臺灣島的實彈軍事演習活動，規模遠超過本研究中 2020 年軍演的案例，更被許多媒體稱為「第四次臺海危機」（林新輝，2022 年 8 月 3 日；湯名暉，2022 年 8 月 6 日）。中共東部戰區更直言此後會「常態組織臺海方向戰備」相關軍演。此演習讓兩岸議題再度成為全球焦點，美國總統拜登甚至在 9 月的專訪重申「美軍將出兵協防臺灣」（Tan & Molloy, 2022, August 3）。

越來越詭譎的世界新地緣政治，使臺灣的經濟、國安和國際話語權，都更受到美中等大國左右。而媒體是人民感知戰爭和國安的重要管道。過去臺灣傳播研究對臺灣涉入其中的國際軍事衝突研究極為有限，本研究希冀以實證研究具體呈現出主流媒體軍事報導框架存在的差異。希望本文的研究成果，能提供媒體從業人員未來對臺灣國際衝突相關報導的參考，並提供社會大眾一起思考如何面對臺海軍事衝突的媒體報導差異以及此差異可能造成民眾之間的資訊落差與分歧。

本研究最大的研究限制之一來自文獻收集的困難。因為兩岸分治七十年，所幸尚未發生重大軍事衝突，但也導致相關研究文獻極為有限，亦缺乏

軍事對峙、武裝衝突或戰爭新聞相關文獻作為發展分析類目的參考。本文的研究概念多參照自國外文獻，這與臺海的軍事衝突脈絡有所差異，也使得本研究的量化編碼以及分析架構可能未臻完善。例如有關戰爭與和平框架的論述，本文作者並無將其二分法的意圖。然而受限過去臺灣相關實證研究文獻的缺乏，本研究擬先就臺灣媒體的軍事報導進行一系統性的鳥瞰分析，各類目的建構修正自國外文獻以及以臺海軍事衝突現況，也具有相當程度的初探性質。建議未來相關研究可以採用語意分析量表進行分析，設法將國外文獻中戰爭新聞學與和平新聞學框架整合成成為一連續性的語意量表，或可更適切地呈現和平新聞學的概念。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過去研究主流平面媒體（或其網路電子報），長期以來均研究《自由時報》、《聯合報》、《蘋果日報》以及《中國時報》。然而《蘋果日報》在 2022 年 8 月 1 日已經停刊，如今易主改為「臺蘋」。相較於其它三個媒體，過去研究或輿論普遍認為《蘋果日報》的政治傾向較為中立。如今「臺蘋」與過去《蘋果日報》的報導立場有何差異？特別是攸關臺灣安全的軍事新聞報導的報導，相信也是未來研究關切的焦點之一。

在質性分析方面，受限於研究人力與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本研究未能深入語意層面，對各報的語句結構或用字遣詞層面進行更進一步的文本分析，也建議未來研究能往此方向進行。

最後，框架研究除了媒體的框架研究外，也存在閱聽眾的接收框架。臺海衝突是未來幾年內重大的國際新聞焦點之一，也攸關臺灣國土的安全。閱聽人在接收媒體報導框架之後，對相關新聞議題所產生的觀點與態度也是傳播過程中非常重要的環節，值得未來研究進一步探索。

而在 2022 年 8 月中共環臺軍演時，各媒體對臺灣民眾反應的觀察也出現兩極：臺灣民意基金會指出約 78% 民眾表示不害怕中國軍演，其中更有 45% 「一點也不害怕」（吳紹瑜，2022 年 8 月 16 日）；但《遠見雜誌》稍晚公佈的民調卻表示「63.6% 民眾憂兩岸開戰、65.4% 減少對政府信任度」（林讓均，2022 年 9 月 1 日），調查結果依然有截然相反、兩極的情況出現。知名國際媒體如 CNN 或路透社（Reuters）則觀察臺灣民眾對中共軍演反應「超淡定」（臺視新聞網，2022 年 8 月 8 日）。究竟兩岸衝突的報導框架可能以何種方式影響閱聽人？或因哪些機制引導閱聽人心中的圖像？這個攸關臺灣安全意識的議題，均亟待未來的研究探索。

參考文獻

- 中央社 (2023 年 1 月 2 日)。〈法新社：2022 年中共擾臺軍機數量激增 逾 1700 架次〉，《中央社》。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2 日，取自 <https://www.cna.com.tw/news/aip/202301020183.aspx>
- 中國臺灣網 (2020 年，12 月 5 日)。〈和平統一希望有多大？兩岸專家提有壓力下“以武促統”〉，《中國臺灣網》。上網日期：2020 年 12 月 5 日，取自 http://www.taiwan.cn/xwzx/la/202012/t20201205_12309551.htm
- 王炯華、陳培煌 (2020 年 8 月 14 日)。〈又武嚇 共軍宣布臺海南北兩端實戰演練〉，《蘋果日報》，4 版。
- 朱真楷、趙婉淳 (2020 年 8 月 14 日)。〈旺旺中時民調顯示 加強兩岸交流 躍主流民意〉，《中國時報》。上網日期：2020 年 8 月 14 日，取自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00814000516-260102?chdtv>
- 自由時報 (2020 年 10 月 7 日)。〈龐皮歐指美國不會坐視中國犯臺 鄭運鵬：國內親中人士可以閉嘴了！〉，《自由時報》。上網日期：2020 年 10 月 7 日，取自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3313903>
- 吳書緯、鍾麗華 (2020 年 8 月 14 日)。〈共軍叫囂臺海軍演 我軍方：恐嚇大於實質〉，《自由時報》。上網日期：2020 年 8 月 14 日，取自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1392991>
- 吳紹瑜 (2022 年 8 月 16 日)。〈7 成 8 國人無懼中共軍演 游盈隆：臺灣人不是被嚇大的〉，《TVBS 新聞網》。上網日期：2020 年 8 月 13 日，取自 <https://news.tvbs.com.tw/politics/1878590>
- 呂伊萱、吳正庭 (2020 年 8 月 24 日)。〈金門紀念 823 AIT 處長首出席 酈英傑悼『聯臺抗中』殉職美軍〉，《自由時報》，1 版。上網日期：2020 年 8 月 24 日，取自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1394988>
- 李俊毅 (2020 年 10 月 6 日)。〈臺海開戰美軍不會幫？專家爆：在國會親耳聽到〉，《中國時報》。上網日期：2020 年 10 月 6 日，取自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01006000778-260407>
- 林海清 (2005)。〈臺灣海權的發展戰略—從海洋政策層面分析 (下)〉，《海軍學術月刊》，39 (1)：4-20。
- 林新輝 (2022 年 8 月 3 日)。〈裴洛西來臺兩岸緊張？一表看懂「四次臺海

- 危機」背景及影響》，《聯合新聞網》。上網日期：2022年8月3日，取自 <https://udn.com/news/story/10930/6508635>
- 林讓均（2022年9月1日）。〈遠見調查／軍演危機好揪心！63.6%民眾憂兩岸開戰、65.4%減少對政府信任度〉，《遠見雜誌》。上網日期：2020年9月1日，取自 <https://www.gvm.com.tw/article/93638>
- 美國之音（2021年7月6日）。〈習近平誓言完成統一大業，官媒配合描繪「攻臺三步驟」〉，《風傳媒》。上網日期：2021年7月6日，取自 <https://www.storm.mg/article/3796422>
- 胡光夏（2008）。〈衝突與戰爭報導的另類典範初探—和平新聞學〉，《復興崗學報》，92：213-243。
- 涂鉅旻、呂伊萱（2020年8月17日）。〈共軍才噙臺海軍演 美艦現東沙〉，《自由時報》。上網日期：2020年8月17日，取自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1393605>
- 許依晨（2020年8月24日）。〈陸學者稱AIT姿態性演出 非官方〉，《中國時報》。上網日期：2020年8月24日，取自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00824000387-260118?chdtv>
- 陳言喬、林汪靜、洪哲政（2020年8月13日）。〈1995、96年臺海危機以來 緊張再現 共軍挑明對臺軍演〉，《聯合報》，1版。
- 陳煜（2021年11月2日）。〈臺灣民意基金會民調〉中共遲早發兵攻臺？最新民調：民進黨支持者最不信〉，《風傳媒》。上網日期：2021年11月2日，取自 <https://www.storm.mg/article/4023390>
- _____（2022年4月26日）。〈臺灣民意基金會民調〉俄烏戰爭衝擊統獨板塊！統派意外淪為「最大輸家」〉，《風傳媒》。上網日期：2022年4月26日，取自 <https://www.storm.mg/article/4304625>
- 陳韻聿（2020年8月5日）。〈美國衛生部長將訪臺 1979年以來層級最高〉，《中央社》。上網日期：2020年8月5日，取自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008055002.aspx>
- 游凱翔（2020年8月13日）。〈共軍：多軍種近日在臺海及南北兩端實戰演練〉，《中央社》。上網日期：2020年8月13日，取自 <https://www.cna.com.tw/news/acn/202008130168.aspx>
- 湯名暉（2022年8月6日）。〈「第四次臺海危機」——習近平對國內外反應的測試〉，《上報》。上網日期：2022年8月6日，取自 <https://>

- 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150979
- 程嘉文 (2020 年 8 月 24 日)。〈蔡赴金門追思 823 AIT 處長陪祭〉，《聯合報》，4 版。
- 程嘉文 (2023 年 7 月 1 日)。〈軍備看似壯觀 國防策略卻待商榷〉，《聯合新聞網》。上網日期：2023 年 7 月 1 日，取自 <https://udn.com/news/story/10930/7270424>
- 黃 紀 (2021 年 3 月 17 日)。〈2016 年至 2020 年「臺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四年期研究規劃 (1/4)：2017 年面訪抽樣調查案 (D00167)〉，《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上網日期：2021 年 3 月 17 日，取自 <https://doi.org/10.6141/TW-SRDA-D00167-1>
- 臧國仁 (1998)。〈新聞報導與真實建構：新聞框架理論的觀點〉，《傳播研究集刊》，3：1-102。
- 臧國仁、鍾蔚文 (1997)。〈框架概念與公共關係策略——有關運用媒介框架的探析〉，《廣告學研究》，9：99-130。
- 臺視新聞網 (2022 年 8 月 8 日)。〈中國軍演臺灣人「超淡定」，外媒記者驚訝〉，《臺視新聞網》。上網日期：2022 年 8 月 8 日，取自 <https://news.ttv.com.tw/news/11108080027000N>
- 薛中鼎 (2018 年 6 月 1 日)。〈共機繞臺的歷史聯想〉，《海峽評論》，330：58-59。
- 闕志儒 (2011)。〈新聞客觀性是否顛撲不破？一種來自網際網路的衝擊〉，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蘋果日報 (2020 年 8 月 24 日)。〈囂張 共機趁蔡返臺 挑釁 3 小時〉，《蘋果日報》，4 版。
- Anderson, T. (2015, October 7). The dirty war on Syria: Barrel bombs, partisan sources and war propaganda. *The Centre for Research on Globalization*. Retrieved October 7, 2015, from <https://www.globalresearch.ca/the-dirty-war-on-syria-barrel-bombs-partisan-sources-and-war-propaganda/5480362>
- Arno, A., & Dissanayake, W. (2019). *The news media i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Routledge.
- Aslam, R. (2011). Peace journalism: A paradigm shift in traditional media

- approach. *Pacific Journalism Review*, 17(1), 119-139.
- Baker, W. D., & Oneal J. R. (2001). Patriotism or opinion leadership? The nature and origins of the “Rally’ Round the Flag” effect.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5(5), 661-687. Retrieved August 11, 2016 from <https://www.jstor.org/stable/3176318>
- Bateson, G. (1955). A theory of play and fantasy. *Psychiatric Research Reports*, 2, 39-51.
- Becker, J. (1982). Communication and peace. The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relation between two categories in social science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19(3), 227-240.
- Beckler, D. T., Thumser, Z. C., Schofield, J. S., & Marasco, P. D. (2018). Reliability in evaluator-based tests: Using simulation-constructed models to determine contextually relevant agreement thresholds. *BMC Medical Research Methodology*, 18, 141. Retrieved February 17, 2020, from <https://doi.org/10.1186/s12874-018-0606-7>
- Blanchette, J., Edel, C., Johnstone, C. B., Kennedy, S., Cha, V., Kim, E., & Poling, G. B. (2022, August 15). Speaker Pelosi’s Taiwan visit: Implications for the Indo-Pacifi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trieved August 15, 2022, from <https://www.csis.org/analysis/speaker-pelosis-taiwan-visit-implications-indo-pacific>
- Brewer, J. D. (2006). Memory, truth and victimhood in post-trauma societies. In G. Delanty & K. Kumar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pp.214-224). Sage Publications.
- Brody, R. A. (1991). *Assessing the president: The media, elite opinion, and public suppor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arletta, J. (1996). Assessing agreement on classification tasks: The kappa statistic.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22 (2), 249-254.
- Chungs, M.Y., Lessman, J. R., & Fan, M. (2014). Framing the nuke: how news media among countries in the six-party talks framed north Korea’s nuclear test. *North Korean Review*, 10(1), 22-38.
- de Vreese, C. H., Peter, J., & Semetko, H. A. (2001). Framing politics at the launch of the euro: A cross-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y of frames in the

- new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8(2), 107-122.
- DeCillia, B. (2018). "But it is not getting any safer!": The contested dynamic of framing Canada's military mission in Afghanistan.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Revue canadienne de science politique*, 51(1), 155-177. <https://doi.org/10.1017/S0008423917000634>
- Dutta-Bergman, M. J. (2006). U.S.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middle east: A critical cultural approach.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30(2), 102-124. <https://doi.org/10.1177/0196859905285286>
-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2021) EIU Risk Outlook 2022.10 scenarios that could impact global growth and inflation.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Retrieved October 27, 2021, from <https://primo-nederland.eu/wp-content/uploads/sites/2/2021/10/risk-outlook-2022-new-verkleind.pdf>
- Entman, R. M. (1993). Framing: Toward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4), 51-58.
- _____. (2004). *Projections of power: Framing news, public opinion, and U.S. foreign polic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Evans, M. (2010). Fram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Media coverage of fighting in the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a & Cultural Politics*, 6(2), 209-233.
- Fawcett, L. (2002). Why peace journalism isn't news. *Journalism Studies*, 3(2), 213-223.
- FitzGerald, J. (2022, August 14). US Taiwan: Congress team follows Pelosi with second high-level visit in a month. *BBC*. Retrieved August 14, 2022, from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62541750>
- Flowerdew, J., & Leong, S. (2007). Metaphors in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patriotism: the case of Hong Kong's constitutional reform debate. *Discourse & Society*, 18(3), 273-294. <https://doi.org/10.1177/0957926507075476>
- Fong, Y. L., & Koon, J. H. G. (2019).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and war/peace journalism: A framing analysis of a Malaysian newspaper. *KOME: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re Communication inquiry*, 7(2), 17-36.
- Forgette, R., & Morris, J. S. (2006). High-conflict television news and public opinion.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59(3), 447-456.

- Galtung, J. (1986). On the role of the media in worldwide security and peace. *Peace and Communication*, 12(4), 249-266.
- _____. (1998). *Peace journalism: What, why, who, how, when, where*. Paper presented in the workshop, "What are journalists for?" TRANSCEND, Taplow Court, UK.
- _____. (2002). The USA, the West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A research agenda for peace. *Development*, 45, 65-67. <https://doi.org/10.1057/palgrave.development.1110352>
- Gamson, W. A. (1992). *Talking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ans, H. J. (1979). Deciding what's news: Story suitability. *Society*, 16, 65-77.
- Garrison, D. R. (1991). Critical thinking and adult education: A conceptual model for developing critical thinking in adult learn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felong Education*, 10(4), 287-303.
- Ginosar, A. (2015). Understanding patriotic journalism: Culture, ideology and professional behavior. *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30(4), 289-301.
- Goffman, E. (1974).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raber, D. (2003). The media and democracy: Beyond myths and stereotype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6(1), 139-160.
- Hackett R. A., Gruneau, R., & Gutstein, D. (2000). *The missing news: Filters and blind spots in Canada's press*.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Hanitzsch, T. (2007). Situating peace journalism in journalism studies: A critical appraisal. *Conflict & Communication Online*, 6(2). Retrieved May 6, 2021, from https://regener-online.de/journalcco/2007_2/pdf/hanitzsch.pdf
- Hussain, S., & Siraj, S. A. (2018). Coverage of Taliban conflict in the Pak-Afghan pres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81(4), 305-326.
- Kellner, D. (1992). Popular cul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ostmodern identities. In S. Lash & J. Friedman (Eds.), *Modernity and identity* (pp.141-177). Blackwell.
- Kempf, W. (2002). Conflict coverage and conflict escalation. In W. Kempf & H.

- Luostarinen (Eds.), *Journalism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 Vol II studying war and the media* (pp.59-72). Nordicom.
- Lee, S. T., & Maslog, C. C. (2005). War or peace journalism? Asian newspaper coverage of conflict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5(2), 311-329.
- Lynch, D. J., & McGoldrick, A. (2005). *Peace Journalism*. Hawthorn Press.
- Lynch, D. J. (2006). Motivational factors, learning strategies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as predictors of course grades. *College Student Journal*, 40 (2), 423-428.
- Moshe, M. (2004). Between national and 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 framing financial patriotic discourse. *Journalism Studies*, 5(4), 497-509.
- Nelson, L. J., Moore, D. L., Olivetti, J. & Scott, T. (1997). General and personal mortality salience and nationalistic bia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3(8), 884-892. Retrieved June 5, 2018, from <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97238008>
- Neuman, W. R., Just, M. R., & Crigler, A. N. (1992). *Common knowledge: New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meaning*.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Nosseck, H. (2004). Our news and their news: The role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coverage of foreign news. *Journalism*, 5(3), 343-368.
- Peake J. S. (2001) Presidential agenda setting in foreign policy.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54(1), 69-86.
- Peleg, S. (2007). In defense of peace journalism: A rejoinder. *Conflict & Communication Online*, 6(2), 1-9.
- Perloff, R. M. (2014). *The dynamics of persuasion communication and attitud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ommunication series) (4th ed.). Routledge.
- Putnam, L. L., & Shoemaker, M. (2007). Changes in conflict framing in the news coverage of an environmental conflict. *Journal of Dispute Resolution*, 2007(1). Retrieved October 9, 2015, from <https://scholarship.law.missouri.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527&context=jdr>
-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2022). Digital News Report 2022.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Retrieved June 15, 2022, from <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digital-news-report/2022>
- Reynolds, A., & Barnett, B. (2003). “America under attack”: CNN’s verbal and

- visual framing of September 11. In S. Chermak, F. Y. Bailey & M. Brown (Eds.), *Media Representations of September 11* (pp.85-102). Praeger.
- Rising, D. (2021, October 14). Taiwan tensions raise fears of US-China conflict in Asia. *Associated Press*. Retrieved October 14, 2021, from <https://apnews.com/article/lifestyle-business-taiwan-beijing-holidays-2028102f8502ed809848e8a147d0413c>
- Rojecki, A. (1999). *Silencing the opposition: Antinuclear movements and the media in the Cold War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Rutenberg, J., & Carter, B. (2001, November 15). The media business; ABC and CBS discuss sharing of news costs.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November 15, 2001, from <https://www.nytimes.com/2001/11/15/business/the-media-business-abc-and-cbs-discuss-sharing-of-news-costs.html>
- Schaar, J. H. (1981). *Legitimacy in the modern state*.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Schudson, M. (2003). *The sociology of news*. W. W. Norton & Company.
- Schwalbe, C. B., Silcock, B., & Keith, S. (2008). Visual framing of the early weeks of the U.S.-led invasion of Iraq: Applying the master war narrative to electronic and print images.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52(3), 448-465.
- Sennett, R. (2003). A nation's narrative. *Index on Censorship*, 32(3), 32-34.
- Shoemaker, P. J., & Reese, S. D. (1996). *Mediating the message: Theories of influence on mass media content* (2nd Ed.) Longman.
- Shoemaker, P. J., Danielian, L. H., & Brendlinger, N. (1991). Deviant acts, risky business and U.S. interests: The newsworthiness of world event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68(4): 781-795.
-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2020). 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SIPRI*. Retrieved April 25, 2022, from <https://milex.sipri.org/sipri>
- Tan, Y., & Molloy, D. (2022, August 3). Taiwan: Nancy Pelosi meets president Tsai to Beijing's fury. *BBC*. Retrieved August 3, 2022, from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62398029>
- Tankard, J., Hendrickson, L., Silberman, J., Bliss, K., & Ghanem, S. (1991,

- August). *Media frames: Approaches to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Boston.
-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21).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trieved November 3, 2021, from <https://media.defense.gov/2021/Nov/03/2002885874/-1/-1/0/2021-CMPR-FINAL.PDF>
- Thetela, P. (2001). Critique discourses and ideology in newspaper reports : A discourse analysis of the South African press reports on the 1998 SADC's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Lesotho. *Discourse & Society*, 12(3), 347-370.
- Tunstall, J. (1971). *Journalists at work: Specialist correspondents: Their news organizations, news sources, and competitor-colleagues*. Constable.
- Viner, K. (2016, July 12). How technology disrupted the truth. *The Guardian*. Retrieved July 12, 2016 from <https://www.theguardian.com/media/2016/jul/12/how-technology-disrupted-the-truth>
- Weaver, D. H., & Wilhoit, G. C. (1986). *The American journalist: A portrait of U.S. news people and their work*.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本文引用格式

- 那瀉、王泰俐、劉好迪 (2023)。〈臺灣媒體對中國大陸軍事新聞報導框架分析—以 2020 年 8 月解放軍軍演為例〉，《傳播研究與實踐》，13 (2) : 29-71。 <https://dx.doi.org/10.53106/222114112023071302003>
- Na, H., Wang, T. L., & Rauchfleisch, A. (2023). Peace or war? Framing analysis of Taiwan media's military news reports on the conflict in the Taiwan Strait.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13(2), 29-71. <https://dx.doi.org/10.53106/222114112023071302003> [Text in Chinese]

Peace or War? Framing Analysis of Taiwan Media's Military News Reports on the Conflict in the Taiwan Strait

NA, Hau

Graduate Student,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WANG, Tai-Li *

Professor,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RAUCHFLEISCH, Adrian

Associate Professor,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news coverage of the August 2020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military exercise against Taiwan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content discrepancies, attitudes, and political leanings of the four mainstream media outlets in Taiwan regarding cross-strait conflict issues. Using the theories of war/peace journalism framework and patriotism framework, the study analyzed and compared the choices of news sources, the uses of keywords, and the portrayals of events among different media. Quantitativ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coverage of four different media in Taiwan in terms of the expressions of favorability towards the home country or the adversary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the positions adopted in reporting on whether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n dete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CP) military aggression against Taiwan, and the uses of reporting framework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terms of choices of news sources and the number of news item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China Times tended to use peace journalism frameworks. The Liberty Times and the Apple Daily leaned towards war journalism frameworks and patriotism framework, tended to express negative sentiments toward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believed that China cannot successfully invade Taiwan by force. The United Daily News, in comparison, maintained a relatively neutral stance. Qualitative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were included to



世新大學
新聞傳播學院
SHIN HSIN UNIVERSITY
COLLEGE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傳播
研究與實踐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舍我 紀念館
Cheng Shuei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interpret the findings at the end of the study, as well as the limitations of the study an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study.

Key Words: Peace Journalism, Military News, News Framing, the conflict in the Taiwan Strait, Military Journalism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tailiw@ntu.edu.tw

Received: 2023.01.21; Accepted: 2023.06.11

